

漢字圈國家的文字政策發展趨向之探討

黃建銘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教授

摘要

由於文字承載著一個民族與國家的文明，本身既是一種符號，也代表著一種民族思維。漢字發源於中國，蘊藏著濃厚的中原文化與文明，隨著漢字向中原以外地區傳播，而影響周邊國家，如日本、韓國與越南，形成漢字圈國家。

本研究聚焦於中國、日本、韓國以及越南的文字政策演變，發現漢字圈國家文字政策呈現幾項特質，包括以漢字為基礎的跨文化學習、對自創文字的鄙視、文字政策的政治化影響、漢字簡化與使用數量減少等。另外，漢字圈國家文字政策也呈現若干差異，包括漢字簡化程度之差異、對漢字依賴程度之差異、民族文字形成之不同、民族文字政策推動之差異等面向。

整體而言，漢字圈國家過去雖受到漢字影響，然而現今已進入民族文字興起之時代，漢字圈國家文字政策也從「事大」思維轉向強化其民族文字獨特性的方向。

關鍵字：漢字圈、文字政策、假名、諺文、國語字

壹、前言

漢字發源於中國，除影響現今中國各地的書寫系統設計之外，也向中國境外傳播，形成漢字文化圈，因此在歷史上曾經使用漢字或現今仍在使用者可謂之屬漢字圈國家。當前受漢字影響最深的國家除我國外，尚有中國大陸、日本、韓國、朝鮮以及越南。由於受到各國歷史發展與民族意識影響的關係，這些國家對漢字的態度與立場不盡相同，連帶影響各國文字政策的發展。

對我國而言，現今仍採行繁體漢字的書寫方式；然中國大陸在漢字的使用上，曾有廢除漢字改採羅馬拼音的書寫系統，後來雖未實現，但基於漢字的書寫效率以及掃除文盲的考量，漢字趨向簡化，形成簡體字的書寫系統；日本則參採漢字的設計，自創平假名與片假名作為書寫工具，並採取假名與漢字共用的混合方式形成其獨特的書寫方式；韓國早期雖使用漢字，但在朝鮮時期自創諺文，逐漸取代漢字，因而目前已大量減少漢字的使用，自創的諺文書寫方式成為主流，但漢字的影響力仍在，如韓語中仍有諸多漢字詞；越南歷史上曾參考漢字形體自創喃字系統，然而因書寫較漢字複雜，流傳不便而遭到廢棄，其後受西方勢力影響以及越南共產黨的脫漢影響，全然廢棄漢字的使用，改採拉丁字母書寫系統，其謂之為「國語字」。從這些國家的書寫系統的轉變可以了解漢字對這些國家的文字政策有著深遠影響，因而形成現今這種多樣化發展，因此本研究主要在探討何以漢字圈國家的文字政策發展存在何種特質與殊異性，其文字政策的差異與變遷究竟受何種因素所影響。

為能理析漢字圈國家文字的演變趨向，從而比較其差異，本研究試圖透過歷史途徑探討漢字圈國家的文字歷史發展脈絡，藉由對各國歷史的檢視了解各國文字政策變遷的影響因素，在各國的歷史系絡中窺探其政治局勢的變化與跨國性的連動關係，故本研究主要以文獻探討作為研究方法進行漢字圈國家文字政策變遷之梳理，進而了解漢字在漢字圈國家的影響力。藉由此一研究可以了解各國文字變遷的影響因素之外，亦可了解漢字與漢字圈國家文化的連結與未來的發展趨向。

貳、漢字傳播與漢字圈國家

文字承載著民族與國家的文明，本身既是一種符號，也代表著一種民族思維、思考邏輯以及文化特質，因此文字隨著人類的移動而具有流動性與擴散性，從人類歷史演進的角度觀察，透過文字所承載的文化力，文字的流動與擴散也代表文字使用空間的擴大化，以及文明的滲透力，因而不同的文字間在擴散過程中，將因接觸而產生文字間的競爭，或因文字學習而產生不同的變易，如兩河流域的蘇美人所創的楔形文字以及埃及人所創的聖書體，其影響力甚至及於後來的閃米特字母(Semitic alphabet)，而閃米特字母對於腓尼基(Phoenicia)字母以及阿拉馬字母(Aramaic alphabet)的問世有著深切影響，腓尼基字母更被視為是希臘字母、拉丁字母與西里爾字母的來源。在文字演進過程中，也可能導致國家或民族文字政策的更替，最著名的例子如土耳其將阿拉伯字母改為拉丁字母、越南放棄漢字改採拉丁字母等即為事例，這種文字更替反映文明間競爭所造成的優勝劣敗結果。

截至目前，論者指出世界共有五大文字文化圈，亦即漢字文化圈、拉丁字母文化圈、西里爾字母文化圈、阿拉伯字母文化圈以及印度字母文化圈(鄧章應，2014:256)，就文字影響的角度觀之，漢字文化圈以外的四大文字文化圈均有其發展譜系的連結，而漢字的創立獨立於其他四大文字文化圈，呈現漢字的文字特殊性。而漢字因其傳播所形成的漢字圈，係以漢文化的底蘊為基礎，因此漢字圈所代表的即是漢字為主的漢字文化圈，即指漢字文化由其發源地區往外傳播，因而形成以漢字文化為基礎的區域與民族所構成的體系。

一、漢字傳播

漢民族的發源與主要活動地域源於中國黃河中下游地區，即以此為根據地為基礎，隨著漢帝國以及唐帝國的國勢而將漢文化往其根據地以外傳播，因而作為承載文化的文字也隨著文化的外過而流傳至他方。

若依照時間先後的角度來看，漢字傳播的方向大致可分為向南方與西南方、向東方以及向西北方等幾個方向(王鋒 2003:6-8)。

首先，為向中國南方與西南方傳播，主要是在秦、漢帝國往現今中國南方的征略，秦征服南方百越之地以及漢武帝時期對現今中國西南地區之征伐，都將漢字帶入這些地區，進而影響該地區的文字創造，所謂壯文、白文、苗文、侗文、瑤文及水書等即為其例。

其次，則是向東方傳播，受漢字影響的主要地區即朝鮮半島與日本群島，漢帝國於朝鮮半島置郡縣¹，王鋒(2003:7)指出朝鮮西元 2 世紀至 3 世紀進行漢字文言教育，4 世紀高句麗設太學。其後發展「吏讀」做為紀錄韓語的工具。相傳吏讀草創於高句麗長壽王時期，統一新羅時期薛聰整理而成，係以漢字做為表音或表意之符號(周有光，2000a:25)。李氏朝鮮的世宗召群儒仿八思巴文創立其民族文字「諺文」，諺文雖屬音素文字，但其外型亦受漢字影響而呈現「方塊字」型態。其後漢字經由朝鮮半島傳至日本後，也對日本產生深遠影響，日本出現「片假名」、「平假名」做為紀錄日語之音節文字，而使現今日語的文字以假名與漢字混合使用的書寫型態。

再者，則是向北方及西北方傳播，即指漢字向中國境內北方與西北方傳播，對契丹文字、西夏文字及女真文字影響深遠，在歷史上，這三種文字都曾是官方文字，而三種文字均是立於漢字的基礎所創造出來的文字，儘管這三種文字已不再使用，形成死文字，但卻可看出漢字傳播的影響力。

另就漢字對外的傳播的範圍觀之，約可分為在中國境內與中國境外兩部分，就境內言之，壯文、水書等南方、西南方文字使用並不普及，亦非屬國家官方文字；而西北方契丹、女真及西夏等文字近乎滅失。而中國境外則有日文、韓文以及越南文等受漢字影響深切的國家文字。

而林龍飛(2006:58-59)也指出漢字文化圈有五次向外擴展機會，第一次是輸入朝鮮半島；第二次輸入日本；第三次則是向東南亞，尤其是越南受漢字影響最深；第四次則是近代華人移居歐美的拓展；第五次則是 60 到 90 年代華人移民在歐美區域所形成的「華文文學」。

因此，不論從時間、方向與範圍的角度觀察漢字的傳播，其傳播範圍已經愈來愈廣，然而受漢字影響深遠，在歷史上曾經使用或以漢字為基礎進行文字創

¹ 漢武帝於朝鮮半島設樂浪、臨屯、玄菟以及真番四郡。

造，或受漢字詞彙之影響者，至今成為國家文字並廣為使用而有其官方文字地位者，主要即中國大陸、日本、朝鮮、韓國以及越南，其文字政策之演變也正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研究主題。

二、漢字圈國家

如前所述，本研究主要探討國家以漢字發源地的中國以及受中國漢字影響之其他國家，主要為日本、韓國以及越南。²

參、漢字圈國家文字政策之演變

漢字之設計與具象圖案有其大的關連，仿造具體物象之型態，以描繪成圖畫表達其意涵可謂創造漢字的首要方法，此即謂「象形」，另一象形字透過標示符號以創「指事」字，也屬另一種造字法。然透過物象描繪或附加符號，所造之字終屬有限，難以涵括不同的表達類型，於是透過兩個以上的象形字組合，以會其意之「會意」字成為創造漢字的另一個重要方法，如「休」取人倚木而息即為其例，會意字的產生豐富了漢字的數量與表達作用。後來，以「形」連結「聲」的方式所造出的「形聲」字再度強化漢字的發展，如「河」從「水」之形連結「可」之聲，即為其例。之後輔以「轉注」與「假借」之方法，拓展更為多元的漢字表達與文字效果，而前述「象形」、「指事」、「會意」、「轉注」及「假借」即為漢字造字「六書」之法。

由於漢字源於具體圖像，輔以六書造字，故而漢字為具藝術型態之文字，配合漢語的孤立語特性，其每一文字均具形、聲以及義三要素，故漢字學習必須掌握每一個字符的形聲義，方能有效運用漢字作為表達工具，其學習較之音素文字為難，是以漢字就長久的中國封建社會來說，必須經由一套學習途徑才能「識字」，從而識字也成為一種謀生能力，在封建社會中，書寫文字或認識文字已被知識分子所壟斷，更因漢字書寫不易，使得平民識字能力難以普及。而在漢字傳播到其他地區或國家，更因語系差異而使漢字運用受到阻礙，必須進一步調整。

晚近漢字有趨向簡化之勢，除中國本身進行漢字簡化的文字改革之外，過去受漢字影響深遠的國家也在文字政策方面進行調整，包括日本有自創漢字、減少漢字；韓國則幾乎廢除漢字之使用；越南在歷史上曾以漢字為基礎創造「喃字」，但最終完全放棄漢字。因此，這些國家的文字政策容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茲分述如次。

一、中國大陸

中國為漢字的發源地，漢字以六書為造字之法，長期以來，成為中國人以為傲的文化資產，然而隨著歐美列強勢力因清帝國的衰頹而入侵中國社會，進而也將西洋文明傳入中國，導致中國人認為西方文明優於中國，於是中國知識分子認為當向西洋列強取法富國強兵之道，而中國未及西洋者，與中國使用漢字有極大

²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慣稱北韓或北朝鮮，與大韓民國為同一民族國家，使用同一文字，在其建國之後即廢止漢字之使用，漢字對其文字政策影響較大韓民國為低，故本研究以大韓民國即韓國，作為探討對象。

關連，如梁啟超、沈學盧等，在胡適、陳獨秀的新文化運動的倡導下，如錢玄同者則提出漢字改革，希望透過漢字簡化與減少漢字使用，達到廢除漢字，改以拼音文字書寫的目標。

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後，淵源於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所提出的漢字改革之聲再度興起，1951年毛澤東認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亓婷婷，2009:114），反映出漢字被認為是阻礙國家進步障礙的觀點，1952年中國政府成立「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草擬漢字簡化方案之草案，1956年國務院通過，並公布「漢字簡化方案」，1964年出版「簡化字總表」，漢字簡化係透過簡化偏旁、簡化筆畫以及使用異體字等方式，1986年「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改組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2000年訂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確立漢字作為國家通用文字的地位。

漢字簡化約略分為幾種方式(亓婷婷，2009:117-118)：1.保留原字輪廓，但簡化筆畫，如鳥改為鸟、龜改為龟；2.保留原字特徵不分而省略其他，如醫改為医、婦改為妇；3.使用較為簡單的聲符，如價改為价、廳改為厅；4.另造新形聲字，如進改為进。5.同音代替，如以面代替麵、刮代替颯；6.草書楷化，以龙代替龍、东代替東；7.恢復古字，如從作从；8.偏旁簡化，如說作说、難作难。這種簡化可以看成是一種將漢字轉化成易於學習，以作為消除文盲，普及教育的一種途徑。

二、日本

假名是日本文字的代表，相對於假名者為「真名」，即指漢字，漢字與假名的混合運用構成日本文字的書寫體系，但這種文字的演變有其歷史演進過程，論者指出，日本文字發展過程歷經三大階段：1.假借漢字階段，即漢字的「訓讀」與「音讀」；2.假名創造階段，即「万葉集」所呈現的漢字借用；3.假名字母形成階段，即「片假名」與「平假名」的創造(王鋒 2003:156-159)。

因日本初無文字，又因受漢文化影響，故借用漢字來表達日本語，但因語系與語法結構差異所致，日語屬於黏著語，黏著語是透過字尾詞綴的變化而產生時態與尊卑的語意差別，並借用漢字作為書寫工具，在讀寫之間，漢字形成「訓讀」與「音讀」之別，主要差別在於訓讀借其意；音讀借其音，是以訓讀，保留漢字之意義，但以日語讀之，如教える(おしえる)；音讀則兼採漢字音義，教育(きょういく)。至平安時期「万葉集」即是以漢字作為標記日本語的歌謠集，因歌謠意於民間流傳，相對強化假借漢字語音的標記功能，但因漢字本身並非全然表音文字，且其筆畫繁雜，加上又有諸多同字異因現象，用來標記日本語受到相當的限制，於是透過簡化漢字筆畫或透過漢字形體的改造以創造本身所屬文字成為一種趨向，其一透過簡化漢字筆畫，即形成片假名，論者謂「片」即不完全、部分或半的意涵，片假名即漢字的省略字，透過片假名紀錄日本語的發音與研讀中國的佛教經典(王鋒 2003:159；Gottlieb,1995:3-4)，有關片假名的例子，如「伊」簡化為「イ」、「加」簡化為「カ」即為是例。至於平假名源自漢字草書，將其形體變化較為圓滑的筆畫，如「与」變化為「よ」、「奴」變化為「ぬ」、「也」變化為「や」等，故而平假名被認為是漢字變體字，初時用於詩歌與日常生活書信(王鋒 2003:160；Gottlieb,1995:3)。

聲器官與形狀，母音符號有點、橫、豎所構成，分別蘊藏天圓、地平與人立之意義，亦即天、地、人三才，其後的點逐漸轉變為短橫；2.受漢語音韻影響，而有初聲、中聲與終聲之造字結構；3.具有漢字方塊字之特徵，(王鋒 2003:199-201；紹毅平，2006:82)。諺文雖屬音素文字，但在長期受到漢字影響之下，其造字之型態，並不作如拉丁字母般全然橫行或是蒙古語直行之書寫方式，反而呈現方塊字之字形即是受到漢字影響相當明顯的例子。

四、越南

越南鄰近中國，位於中國南方，在歷史上曾經在秦末西漢(西元前 111 年-西元 39 年)、東漢六朝(西元 43-544 年)、隋唐(西元 603 年-939 年)以及明朝(西元 1407-1427 年)共計四次受到中國統治，在越南歷史上稱為「北屬時期」，也因此越南的政治、文化受中國影響頗深，就文字而言，隨著中國政治勢力的介入，文化也進一步深入越南的社會，漢字也因而成為越南重要的書寫工具，早期越南將漢字成為「儒字」，越南崇尚儒家思想，建文廟(即孔廟)以興孔學，設太學以作為培育人才之搖籃，舉辦科舉考試以拔擢人才，漢語也融入越南語中，現今在越南語中仍有諸多的漢越詞，顯見和文化影響之深。

相傳越南陳朝時期由阮詮創喃字，喃字乃是以漢字為基底，以整個漢字或利用漢字之偏旁，以中國六書造字之法，設計出專屬自己的民族文字(周有光，2000b:34)，但喃字較漢字複雜，又因多數統治者未大力推廣，因此未形成主要文字，及至今日喃字已成為一種死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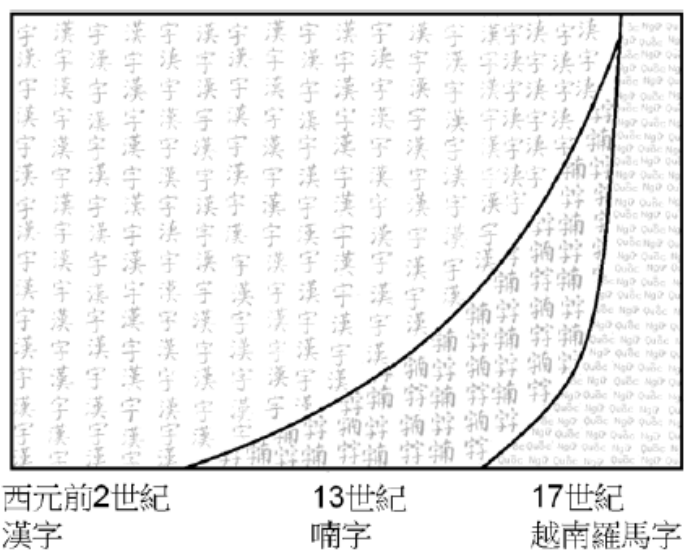


圖 1：越南文字變遷圖(資料來源：張學謙(2014:2))

阮朝後期越南國勢衰頹，法國勢力長驅直入，許多西方傳教士也到越南傳教，基於傳教之便，傳教士以羅馬字拼寫越南語，法國傳教士 Alexandre de Rhodes 修改葡萄牙傳教士所設計的越南羅馬字(周有光，2000b:35)，建立越南語書寫文字，成為日後通用的越南國語字。由於法國亟欲讓越南擺脫中國勢力影響，故積極推廣越南羅馬字，在後來越南共產黨對抗西方勢力並掙脫出殖民地地位後，越南羅馬字因為書寫簡便，對於消除文盲有其助益，故受到越南共產黨的大力推

行，進而取得正式文字的地位，即越南國語字。

肆、漢字圈國家文字政策之特質

本文所討論的漢字圈國家，即中國大陸、日本、韓國與越南，其文字政策的演變雖有不同取向，但卻呈現以下幾項特質。

一、以漢字為基礎的跨文化學習

不論中國大陸、日本、韓國與越南均屬於東亞範圍，而有認為「東亞」不僅是地域的概念；也是一個語言的概念，亦即受漢語影響之作用；也是屬於文化的概念，亦即受到儒家文化影響(林龍飛，2006:59)。漢字圈國家的文字發展代表著以漢字為基礎的文化薰染，不僅儒家文化，藉由佛教經典的傳播更讓漢字的影響力深入漢字圈國家的社會底層，形成一個漢字基底的跨文化學習。

首先，日本的片假名及平假名均與漢字密切相關，正如前述，片假名是一個漢字省略採取部分偏旁的簡化文字，平假名則是仿漢字草書所形成的圓滑型簡化字體，這種文字最初是因漢語與日語結構相異，漢字借用有其侷限性而創造假名以輔助漢字之用，日文書寫方式則為漢字與其民族文字混寫之型態，又因日文同音異字頗多，漢字正足以作為字義區辨的符號，強化文章語意表達之明確性。

再者，以朝鮮半島的諺文來說，其字形雖有參考自八思巴文之情況，然其字形亦仿漢字方塊型態之設計，而非做線性排列，即便母音可單獨發音之字詞，亦均加入啞音之字符「ㅇ」，如아이(孩子)，這樣的設計乃是為求其字形書寫呈現漢字完整的方塊字型，這種文字設計方式明顯呈現出受到漢字影響之痕跡。

而越南在歷史上的喃字也是仿造漢字而設計，當然因喃字將漢字進一步複雜化，故喃字雖代表著越南民族文字的自創成果，然也因其複雜性而限制了其傳播效果，越南歷代僅胡朝與西山朝以喃字作為官方文字，然則這兩個朝代的政權相當短暫，因而喃字的推廣與普及字不如預期，終究消失於歷史洪流之中。儘管越南文字已採用拉丁字母，但諸多的漢越詞，如 nghiên cứu(研究)、 lịch sử(歷史)、 giáo dục(教育)等，不勝枚舉，這些仍標誌著漢字對越南文字的影響性。

二、對自創文字的鄙視

如日本把漢字視為「真名」、「男手」，而自創文字稱為「假名」，平假名則又稱「女手」，亦即漢字為男子所用，平假名則為女子所用，日本男子不屑使用所謂假名(王鋒 2003:160)，在古老封建社會中男女地位不平等，謂之「女手」即具有貶抑、低下之意，被視為低階文字。也有認為直到明治初年，漢字一直是日本正式文字，假名難登大雅之堂(趙守輝，2010:51)。

韓國在諺文創立以後，也如同日本的假名一般，並不受到知識份子的重視，更遑論推廣其運用，知識分子甚至加以鄙視，論者稱諺文即「不正式的文字」，與正式的漢字相對，是低一級文字(邵毅平，2006:80)。

在越南，其自創民族文字的喃字為「南方文字」之意，係利用漢字與六書造字之法所創之文字，喃字必須依靠漢字知識，根據漢越音閱讀，當時多用於使用於民間文學，在官方文書仍以漢字文言為正式文字，漢字的地位高於喃字，漢字

屬於士大夫標示身分的象徵，論者指出越南文人輕視喃字，文人書寫係使用漢字(周有光，2000b:34；張學謙，2014:5-6)。儘管胡朝與西山朝都曾想以喃字取漢字而代之，然而因這些朝代過於短暫，難以建立具有影響力的文字政策，加上士大夫階級未予支持，故而都未能成功，主要的朝代都仍以漢字為宗，顯見喃字在越南歷史上並未受到多數統治者的重視，這種現象主要在於中國國力的強大，另外也因喃字的書寫較漢字複雜所致，整體而言，喃字儘管為越南自創之文字，但在越南社會其地位卻遠不如漢字，甚至受到文人的鄙視。

這種尊崇漢字而鄙視民族文字的現象，係缺乏民族自信心所致，然而因中國當時為國際大國，基於地緣關係中國鄰近國家意欲以中國為取法對象，若能直接學習漢字，則更容易吸收漢文化，這是一種「事大」的民族心理(邵毅平，2006:80-81)，故而尊崇漢字乃是提升其國家地位的象徵，輕視其民族文字自不意外，這與現在諸多國家重視英語的情況相當類似，均是一種「事大」的態度。

三、文字政策的政治化影響

一個受到漢字影響極深的國家，終究完全拋棄漢字的使用，其背後涉及的因素與強勢文化國家之國勢消長不無關聯。漢字圈國家早期受到漢文化影響相當深遠，日本、韓國以及越南的文字均蘊含漢文化影響的成分，然而因清帝國末年的衰敗，漢字圈國家所仰望的學習對象受到來自西方文化的強力挑戰，其優勢地位也因之動搖，甚至連漢字發源地的中國也有諸多知識分子將中國衰落之因素歸諸漢字，文字改革呼聲高漲。

首先，日本在西方勢力侵入之後，其民族自信心大受影響，繼而其標竿學習國家亦從中國轉向西方世界，尤其明治時代，激進主張以外語替代日語者有之，如森有禮主張以英語代日語、志賀直哉主張以法語為官方語言(趙守輝，2010:51)，而主張將漢字廢除者亦有之，如前島密即主張廢止漢字，完全以平假名作為國字，以利普及教育。韓國過去雖然鄙視其自創文字諺文，這是受到朝鮮民族「事大」主義的影響，但後來受日本殖民統治，諺文凸顯朝鮮民族的獨特文化屬性，標示出其對抗日本殖民政權的特質，因而諺文成為朝鮮民族追求獨立自主的象徵。

至於越南，現已採羅馬字作為其官方文字，徹底放棄漢字，這與當時法國殖民越南的政策有關，法國透過越南羅馬字的推動，讓越南文字的書寫趨向簡易。論者認為法國推行越南羅馬字有雙重目的，一是越南羅馬字與法文書寫符號相近，方便從越南羅馬字過渡到法文，最終達到消除越南字，全用法文的目的；另一是越南羅馬字可以切斷越南與中國因漢字所產生的文化連結，強化法國的殖民統治政權(周有光，2000b:36)。亦即漢字被法國認為是法國人與越南人間的障礙，而羅馬字是從越南語過渡到法語的重要媒介(蔣為文，2005:197-198)，因此，漢字所代表的是越南與中國的連結，這種連結被視為視法國殖民越南的阻礙，故而從越南的案例一樣可以看到文字政策的政治化影響。

四、漢字簡化與使用數量減少

漢字文化圈的國家中，漢字不是走向簡化便是減少漢字數量的使用。首先，以漢字發源國家的中國來看，漢字隨著五四運動所倡議的新文化，而倍受挑戰，在中國共產黨主政後，漢字簡化更為積極。

其他受漢文化影響深遠的國家，朝鮮、越南已全然拋棄漢字，韓國則以幾乎不用漢字，而日本算是使用漢字較多的漢字圈國家，但漢字的使用也有減少的趨勢。

因此，漢字簡化與數量的減少，某種程度反映漢字設計與學習的複雜性，在古老封建社會下，知識透過文字傳達，掌握文字便能獲取知識，進而成為權力掌握者，士大夫對文字的壟斷卻成為普及知識傳遞的障礙，若從消除文盲，推廣文字學習的角度來思考，漢字簡化與數量減少，甚至拋棄漢字，即成為一種具有提升知識傳播的有效途徑。

伍、漢字圈國家文字政策之差異

漢字簡化方式的差異，中國以減少漢字筆畫進行文字政策的變革，日本則透過漢字的省略與變形而創造假名，也是漢字簡化的一種型態。韓國則創制諺文，走文字音素化途徑，另闢蹊徑，就諺文的外型觀之，音素文字不以線性排列而採方塊字形，其外觀則比方塊字筆畫少，故仍可算是一種漢字簡化方式。而越南雖在歷史上出現喃字，屬於漢字的複雜化，然而卻未能普及於民間社會，而在 1945 年後，則完全廢除漢字，然而越南語中有諸多漢越詞，以羅馬字表音化，亦比書寫漢字要來得容易。儘管中國、日本、韓國與越南在文字政策變革上呈現一種趨向簡化漢字的路徑，但各國的方式卻存有差異。

一、漢字簡化程度之差異

中國雖是漢字發源地，但卻因西方文化影響，而有拉丁化之議，雖然中國並未真正走向以拼音文字作為其官方文字，但為求書寫便利，漢字簡化成為必然之勢，就簡化程度而言，中國對漢字的簡化程度最深。

日本也是保留使用漢字的國家，然日本是漢字的繼受國家，加上其有假名書寫系統，故漢字的使用數量不及中國，但漢字書寫在日本也同樣有簡化之情況，包括 1.採漢字部分，如聲寫為^声、醫寫為^医、蟲寫為^虫；2.簡化繁複部分，如應寫成^应、藝寫成^芸；3.採用俗體字或異體字，如體寫成^体、關寫成^関、廣寫成^広；4.採草書楷化，如壽寫成^寿。整體而言，日本雖也進行漢字簡化，但對若干漢字偏旁並未如中國那般簡化，如言字旁並未簡化，難或漢亦未簡化成^难或^汉。

二、對漢字依賴程度之差異

前以述及，漢字有簡化與減少之趨向，但就使用數量的角度來看，漢字圈國家仍存在彼此的差異，而這種差異來自其民族文字的設計結構。

首先，日本仍然有漢字之使用，論者認為日語音節較少，結構簡單，加上現代日語詞彙中漢語詞彙占了一半，假名無力承擔大量的漢字詞與同音詞，假名的區別功能受限，漢字因視覺功能強傳遞信息高等特質成為優勢，造成假名無法脫離漢字的現狀(邱子雁，2008:65-66)，而使漢字成為日本文字政策無可或缺的一環，日本對漢字的依賴也相對較深。

對越南、朝鮮及韓國的影響以漢字詞為主，蓋越南與朝鮮文字已脫離漢字使用，韓國雖然有漢字教育，報刊雜誌也有鳳毛麟角般的零星使用，但基本上也不以漢字做為主要書寫系統，所遺留的主要是漢字字音的漢字詞為主。然韓語中的

音節結構複雜，以音節表示將需大量音節字母，故尋求更小的語言單元，即音素字母作為文字設計的基礎，亦因音素複雜性使然，而更能有效發揮區別意義，而能獨立標示韓語(邱子雁，2008:65-66)，因此韓語對漢字的依賴程度不如日語。

至於越南，原有喃字之設計，但並未成為有效的文字標記系統，反而由西方世界所創的國語字成為其現今的書寫工具，加上越南語共有六種音調及 29 個字母，在走向音素化的文字後，越南語減低了對漢字的依賴性，因此越南語成為完全無需依賴漢字的文字體系。

三、民族文字形成之不同

中國固然為漢字發源地，但在其他漢字圈國家中，其民族文字形成卻有不同的方式。

首先，日本的假名以漢字為本，一則透過漢字偏旁形成片假名；另一則透過漢字草書形成平假名。前者係因佛經從百濟傳至日本，奈良和尚因讀佛經，而已漢字作為旁注，幾經簡化，取漢字部分而形成；後者則是平安時代婦女借用漢字草書予以簡化作為記事工具而得(周有光，2011:105)。可見日本民族文字以漢字為基底進行省略與變形而得，而其創造來自民間。

韓國的諺文則非民間所創，而係以李氏朝鮮世宗皇帝為中心所推動的國家文字政策之變革，透過國家力量所形成，即便曾遭受阻礙，但仍是官方為中心所建構的文字書寫系統。

越南的喃字，現今使用之國語字則為外國人所創，胡志明基於民族意識，意欲擺脫漢文化影響，而將其作為官方文字。因此現今越南的民族文字來自外國。張學謙(2014:3)認為越南以羅馬字取代漢字，並成為越南官方文字，在漢字文化圈相當少見，這種取代也是相當成功的文字政策。事實上，由於越南語的語法結構與漢語近似，有論者認為其與漢語同屬孤立語，因而與日語及韓語相較，越南語用漢字標記本族語言所面臨的障礙較少(邱子雁，2009:82)。然而時至今日，越南卻拋棄漢字與喃字，轉而使用西方的羅馬字母作為其書寫系統。

四、民族文字政策推動之差異

就日語而言，假名的創造來自民間，最初為婦女與和尚所用，其後才由官方加以推動。

諺文則是由朝廷所創，早期僅在婦女與僧侶間流傳，故其亦稱「女書」或「僧字」(蔣為文，2011:60)因士大夫階級勢力影響，文字政策阻力來自朝廷內部勢力的反彈。在反日意識下，民族運動興起，諺文地位與接受度提升，諺文成為愛國標誌(周有光，2011:112；蔣為文，2010:55)。Gottlieb(1995:107-108)指出 1910 年日韓合併後，日語成為韓國的國語，並開啟殖民政策，早在 1905 日語已在新課程的選修科目上教授，從成為日本保護國道 1945 年，日語已成義務性教育，韓語在 1938 年後成為自願性(voluntary)學習，這是日本積極同化韓國的作為。其後為強化同化政策，而廢止韓語強迫日語的使用，以迫使韓國人忠於日本價值與統治。

至於越南，喃字除受胡朝與西山朝青睞外，歷朝推動並不積極且喃字構造複雜，不易學習，推動阻力來自中國漢字的影響力太過深遠，蓋漢字是越南科舉制度使用的文字，因而喃字無法廣為流行。及至胡志明採取國語字，則是以官方為

主力所推動，其效果頗為成功。

陸、漢字圈國家文字政策之未來：代結論

除中國為漢字發源國之外，漢字在中國大陸或華人區域仍將是重要的表達工具外，而日本、韓國以及越南均有其民族文字，但其民族文字初創之時，與漢字相較存在高低之別，形成高低文字。論者謂「高文字」具有官方正統地位，使用於正式場合；「低文字」則被認為是粗俗與沒水準的文字(蔣為文，2010:54)，然而隨時代變遷，現已進入民族文字興起之時代，茲就日本、韓國以及越南的情況說明漢字圈國家的文字政策的未來發展。

一、日本

首先就日本而論，其民族文字為假名，假名地位由高而低的歷史發展，回應日本文字政策的重要變遷。周有光(2011:107)謂假名最初作為注音符號之用，但後來文字地位提升，首先從站立於文字之旁，走進文字中間；其次，從漢字為主，假名為輔轉變成假名為主，漢字為輔。Gottlieb(1995:4)亦指出假名最初標記於直式書寫中文的右側，用以注釋，其後將假名與漢字混用，形成「漢字假名混じり文」(kanji- kana-majiribun)，逐漸凸顯其民族自創文字的地位與重要性。因此在明治維新時代，是否廢除漢字也受到諸多討論，然而基於假名音節文字難以處理同音異字的問題，漢字對日語書面語義的表達起了關鍵效果，未來漢字仍將在日本文字政策中占有重要角色。

二、韓國

其次，諺文是屬於朝鮮民族的獨創文字，其地位亦如假名那般由低轉高，周有光(2011:111)指出朝鮮半島文字分為若干發展階段：1.漢字文言文；2.七世紀起漢字文言文為正式文字，吏讀為民間文字；3.西元 1446 年漢字文言文為正式文字，吏讀與諺文為民間文字；4.十九世紀漢字與諺文混合體為正式文字；5.二戰後，朝鮮全面採諺文，韓國初期採漢字與諺文混合體，後來也以諺文為主。這種情況在民族自信的驅使之下，中國以外的漢字圈國家都將減少漢字的數量，然而基於歷史深層的影響力，即便漢字不以字型凸顯其影響效果，但諸多漢字詞卻仍然深植於各國的語言之中，以韓國為例，친구(親舊)意指朋友；선물(膳物)意指禮物，即使不以漢字字型表現，但漢字字音的影響仍在。

所以，韓國也逐漸重視並恢復漢字教育，論者指出這種現象基於兩方面考量，其一是縱向考量，不恢復漢字教育，韓國人難以閱讀自身的歷史典籍，傳承歷史文化；其二從橫向面考量，因中韓雙邊貿易活絡，中國是韓國重要的貿易對象，恢復漢字有助於貿易(詹小洪，2007:78)，因此韓國基於歷史與經貿因素的角度思考漢字教育，認為漢字教育對其國家長遠發展有所助益。

由此可見，漢字在漢字圈的興衰與其發源地中國的國勢有很強的關聯性，當中國國勢衰退，漢字被視為國家進步的阻礙，邵毅平(2006:83)認為當中國失去東亞國際領導地位，導致朝鮮民族對朝鮮文字與漢字態度的態度逆轉。但當中國國勢轉強，漢字也再度受到重視，尤其韓國企業界更敏銳察覺漢字對企業經營的重要性，三星集團就以有否漢字資格證書，作為錄取與否的考量(詹小洪，2007:80)，

漢字的學習將成為架接中國的重要橋梁。

三、越南

至於越南，其歷史上雖出現喃字，但因喃字必須以漢字為基礎，喃字筆畫更為繁複，學習不易，加上科舉制度係以漢字作為取材工具，知識分子仍以漢字為尊，這種喃字在未有官方強力推動之下，逐漸式微，十七世紀由外國傳教士所創立的羅馬字反而取代漢字，且收到消滅文盲的良好效果，因此即便越南與中國有地緣接近的密切互動，漢字未來仍不可能在越南變成主要文字，然而漢越詞仍然成為越南語中的重要元素，這對於越南人而言，因與中文的語法架構近似，即便無漢字為媒介，藉由越南國語字學習中文仍將收到很好的效果。

綜觀淵源於漢字的民族文字，片假名創於約六世紀，平假名則約創於九世紀；諺文則創於十五世紀；越南喃字創於約十三世紀，而越南國語字則創於十七世紀，如下表所示。

表 1：漢字圈國家民族文字創立時間(資料來源：作者)

拼音文字	片假名	平假名		諺文	越南國語字
	六世紀	九世紀		十五世紀	十七世紀
非拼音文字			喃字		
			十三世紀		

從上表可知，除喃字是漢字的複雜化之非拼音文字之外，其餘國家民族文字則顯現出走向拼音文字的趨勢，尤其從音節文字走向音素文字的趨勢，儘管越南國語字採取羅馬字為書寫工具，在外型上似乎與漢字有諸多差異，然而越南語中存在許多漢越詞，且越南語語法與漢語相近，仍可視為漢字走向拼音化的類型。論者指出漢字圈國家的文字已走向拼音文字，而其動力係因能準確拼寫詞語、減少學習文字的負擔、能夠進行大眾化的普及教育、達到語言文字經濟化目標(劉桂英, 2003:60)，而漢字圈國家文字政策也從「事大」思維轉向強化其民族文字獨特性的方向，然而漢字雖不以形體為主要影響，但其詞語的淵源與使用，卻很難脫離漢字的影響。

參考文獻

- 亓婷婷(2009)〈從中共文字改革歷史看簡化字〉，《師大學報：語言與文學類》，54(2)：107-133。
- 王 鋒(2003)《從漢字到漢字系文字—漢字文化圈文字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邱子雁(2008)〈從漢字傳播的角度比較日本、朝鮮的文字系統〉，《現代語文》12：65-66。
- 邱子雁(2009)〈朝鮮半島、日本、越南漢字系文字的比較研究〉，《龍岩學院學報》，27(1)：81-84。
- 邵毅平(2006)〈朝鮮自創文字的智慧〉，《歷史月刊》，216：77-84。
- 林龍飛(2006)〈東亞漢字文化圈及形成析論〉，《東南亞縱衡》，8：58-62。
- 周有光(2000a)〈朝鮮文化的歷史演變_漢字文化圈的文化演變之二〉，《群

- 言 ,Popular Tribune 》, 2 : 24-27 。
- 周有光(2000)〈越南文化的歷史演變_漢字文化圈的文化演變之四〉,《群言 ,Popular Tribune 》, 4 : 33-36 。
- 周有光(2011)《世界文字發展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張學謙(2014)〈從外國字到國語字—民族主義、現代化與越南羅馬字政策〉,《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10(1) : 1-28 。
- 詹小洪(2007)〈韓國向漢字文化圈回歸〉,《炎黃春秋》 2 : 78-80)
- 趙守輝(2010)〈日本漢字的近代演變、動因及啟示〉,《外國問題研究》, 197 : 50-56 。
- 蔣為文(2005)《語言、認同與去殖民》,臺南:國立成功大學。
- 蔣為文(2010)〈《訓民正音》語文政策與韓國文字之崛起〉,《臺灣國際研究期刊》, 6(4) : 53-69 。
- 劉桂英(2003)〈從漢字文化圈看拼音文字的形成與演變〉,《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4(3) : 59-62 。
- 鄧章應(2014)《普通文字學概要》,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 Gottlieb, Nanette (1995) Kanji Politics: Language Policy and Japanese Script, NY:Kegan Paul International.